

社会失信环境与民营企业成长

——来自城市失信人的经验证据

余泳泽, 郭梦华, 胡山

[摘要] 本文以中国地级城市民营企业为研究样本,从社会失信环境的视角出发,以地区佛教寺院数量为工具变量,整合微观层面的工业企业数据,系统考察了社会失信环境对民营企业成长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探寻社会失信环境阻碍民营企业成长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社会失信环境对于本地区民营企业成长具有显著的阻碍作用,尤其表现在经济更为发达的东中部地区、一二线城市和高收入城市;就企业规模而言,中小型民营企业的成长更加受制于本地区的失信环境,而大型民营企业由于其规模和品牌做“背书”,受社会失信环境的影响较小;中间机制检验表明,社会失信环境会通过提高交易成本、加深融资约束程度和阻碍企业创新来抑制本地区民营企业成长。研究结论对于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的实施为契机,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从而促进民营企业健康成长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社会失信; 民营企业; 交易成本; 信息不对称

[中图分类号]F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80X(2020)09-0137-19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凭借自身适应性强、机制灵活等特点,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开拓国际市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有关民营经济的定位,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指出,“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变,我们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我们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没有变。”统计数据表明,民营企业数量占中国企业总数的90%左右,但是其平均生命周期不足三年,超过98%的民营企业在成立十年内都会走向倒闭。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中国政府更加重视地区营商环境改善对民营经济成长的重要意义,相继出台了《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等法律法规。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明确提出,“支持民营企

[收稿日期] 2020-03-27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约束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理论机制、效应识别与政策优化”(批准号71973060);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经济增长目标约束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及实证研究”(批准号18YJA790098)。

[作者简介] 余泳泽,南京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郭梦华,南京财经大学产业发展研究院硕士研究生;胡山,南京财经大学产业发展研究院硕士研究生。通讯作者:郭梦华,电子邮箱:15852909539@163.com。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和编辑部的宝贵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业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 2020》显示,中国大陆 2019 年度全球营商便利度排名第 31 位,并连续两年入选全球优化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十大经济体。但是根据《全球营商环境报告 2020》,中国在“建立信用”方面的改革措施还有待加强,信用建设始终是制约营商环境改善和企业持续健康成长的重要一环。

图 1 反映了 2007—2017 年中国企业失信被执行人(法人)数量变动情况,其中东部地区的失信被执行人(法人)数量从 2007 年的 2895 个增加到 2017 年的 118223 个,增长近 40 倍。法人失信行为增加的趋势不断攀升佐证了企业信用缺失严重这一现实问题。为消除信用缺失对经济增长的消极影响,改善营商环境,对信用缺失最敏感的金融部门最早开始了治理社会失信环境的“建设性”探索。2006 年中国人民银行建立了全国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为 1600 多万家企业和近 7 亿个自然人建立信用档案,初步实现了商业银行之间关于借款人的信用信息共享。2013 年 7 月 1 日,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将具有“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等情形之一的被执行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于 10 月 8 日向社会开通“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社会各界均能够通过该平台查询全国法院(不包括军事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同时,为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失信被执行人进行失信惩戒,促使其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有关部门依照规定向失信被执行人发出了限制消费令,失信被执行人不得从事旅行、度假以及乘坐飞机等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①。以此为标志,针对失信被执行人的规范手段由原先的道德谴责等非正式制度上升为强制执行的信用惩戒的正式制度。随着联合惩戒作用日益凸显,被执行人迫于失信惩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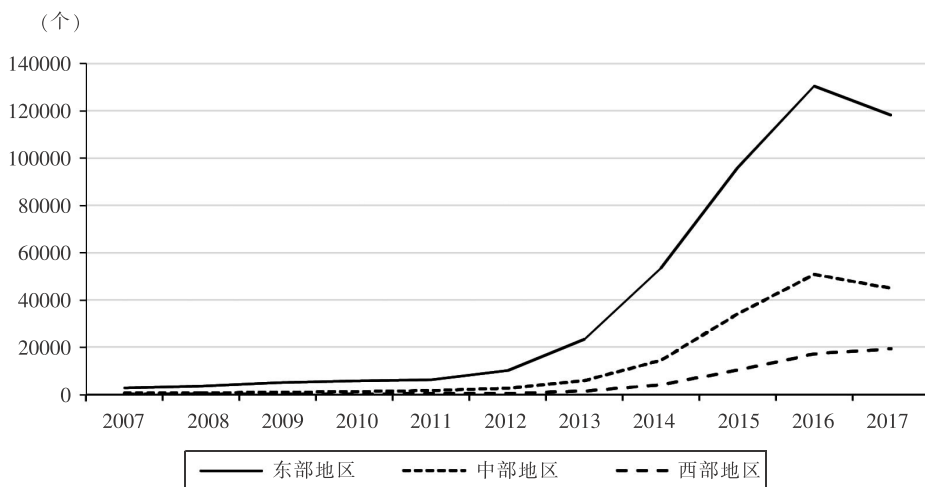


图 1 2007—2017 年东中西三大区域企业失信情况

资料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开通的“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平台。

^① 被执行人为自然人的,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以上舱位;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购买非经营必需车辆;旅游、度假;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乘坐 G 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列车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被执行人为单位的,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实施前述行为。

压力自动履约。截至2019年6月,中国已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1443万人次,占中国总人口的比例约为1.03%。

社会失信作为社会信用文化缺失和社会信用体系不够健全的共同产物对于民营企业成长影响深远。但是关注企业成长的文献大多强调企业能力和资源异质性,忽略了社会失信环境的作用。强调企业能力和资源异质性的内生长理论认为企业自身的技术创新水平、融资能力以及企业家能力是制约民营企业成长的关键因素(杜传忠和郭树龙,2012;Acemoglu et al.,2013;Bloom et al.,2013;余明桂等,2019);强调社会外部环境的产业组织理论认为宏观层面的政府政策、财税体系以及社会服务体系深刻影响着民营企业的成长潜力(黄速建等,2008;杨继生和黎娇龙,2018;徐光等,2019)。关注营商环境的文献表明,优化营商环境有利于无寻租企业增大研发投入(何凌云和陶东杰,2018),开展自主创新(夏后学等,2017)。在正式制度层面,一些学者认为制度环境在中国民营企业的成长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例如,He(2009)认为,经济政治改革带来了制度转型从而为民营企业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营商环境、关系网络和社会资源。而Zhao(2009)的研究表明,政府政策的不公平会直接导致民营企业绩效低迷。学者对于民营企业成长所需正式制度环境的关注焦点在于政治关联的存在与否及其影响因素。在法律制度不完善、产权保护不充分或者金融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情况下民营企业更倾向于建立政治关系以获取政治庇护,而这一动机往往来自于实现民营企业的成长(邬爱其和金宝敏,2008)。在非正式制度层面,Acemoglu et al.(2013)研究发现,非正式制度的改善会提高产品复杂度较高企业的分工水平,降低契约履行的风险度,从而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契约环境的不完善容易导致事后再谈判过程中投资方企业面临被“敲竹杠”的风险,致使投资的无效率。国内学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则主要关注于社会信任方面。李四海等(2013)的研究结论表明,良好的社会信任度能够提高民营企业在银行贷款的比重,延长贷款期限以及降低贷款成本。除此之外,社会信任水平提升还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知识转移和产学研合作创新(陈叶烽等,2010)。

本文以中国2004—2013年23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工业企业为研究样本,利用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数据和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从社会失信环境的制度属性视角识别社会失信环境对民营企业成长的影响及内在机制。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①在民营企业成长的相关研究中,绝大部分关注了技术创新、融资约束、政治关联、财政补贴等对民营企业成长的影响(王伟光等,2015;曹春方等,2015;罗党论和甄丽明,2008;杨继生和黎娇龙,2018),有关社会失信环境影响民营企业成长的文献较少。仅有的文献中,戴亦一等(2019)首次利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失信被执行人数据度量地区诚信水平实证检验地区诚信水平对上市公司银行借款比例的影响。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在失信环境下能够获得更多的银行借款。本文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重点识别了社会失信环境与民营企业成长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拓宽了现有文献对民营企业成长的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②既有文献中对于地区社会信任的测度大多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WVS)、欧洲社会调查(European Social Survey,ESS)、美国综合社会调查(General Social Survey,GSS)等组织机构的跨国问卷调查数据(Knack and Keefer,1997;Zak and Knack,2001;Dincer and Uslander,2010),这种做法存在以下两种问题:一是潜在的测量误差偏误。由于调查中可能存在“光晕效应”,即受访者在回答问卷的过程中情绪可能会因为某些问题或者问卷中问题的次序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到问卷结果的真实性。问卷的答案与受访者实际行为之间潜在的不一致性也会加大测量误差对回归结果的不利影响。二是存在样本选择偏误。Dincer and Uslander(2010)认为社会信用与增长的实证结果之所以存在不一致性,很大原因是研究

者所选择的样本不同,由于问卷样本数量的缺少导致的误差要远大于变量缺少导致的误差。因此,为获得大样本数据同时降低由于测量误差对回归结果带来的不利影响,本文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2004—2013年23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失信被执行人数据为基础构建了社会失信指标,进一步拓展并丰富了关于社会信用方面的研究,提高了研究结论的可信度。③现有的一系列探究信用的经济绩效影响的文献将研究视角集中于社会信用如何通过信任机制和信誉机制发挥作用(Laursen et al.,2012;Xie et al.,2017)。本文认为不同于信任强调人际交往及经济往来中施加于对方的道德信心,信用是建立在功利基础之上,伴随着借贷关系而产生的一种债权债务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契约精神。社会信用是以信任为前提和基础的、发生在授信人和受信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因此,本文基于守信意识缺失和信用体系不健全的现实处境,从社会失信环境的制度属性视角出发,剖析其对微观企业行为的影响,进而识别其与民营企业成长之间的因果关系,丰富了现有文献中有关信息经济学方面的研究。

二、理论机制

信息不对称理论是研究市场交易行为和市场运行效率的重要理论。信息不对称现象是产生“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外因,而交易者的信用意识和道德素养则是产生“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内因。社会失信环境根源于地区诚信水平的低下和信用意识的薄弱,这加剧了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状态,从而影响经济运行效率。本文以社会失信环境为切入点,以信息不对称理论为媒介,考察社会失信环境如何通过影响个体行为进而影响民营企业的交易成本、融资能力、创新水平。理论机制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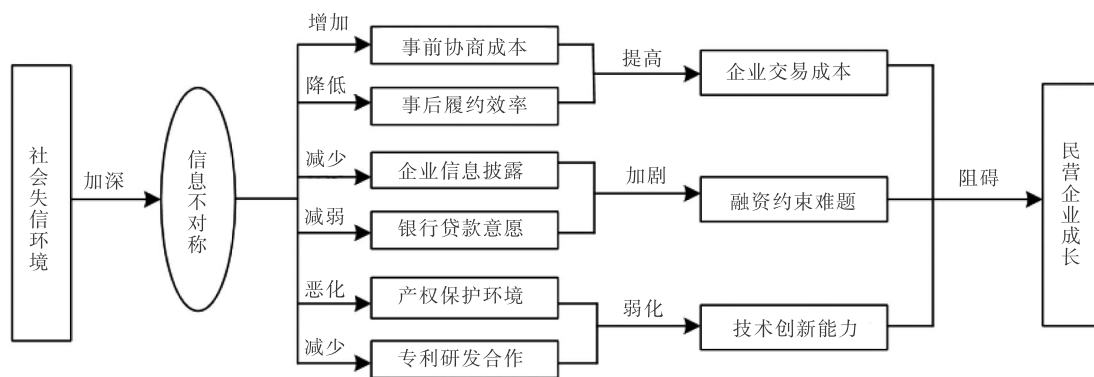


图2 社会失信环境阻碍民营企业成长的传导机制

1. 社会失信环境通过增加民营企业交易成本阻碍民营企业成长

交易成本是企业因参与市场交换而产生的费用。对民营企业而言,过高的交易成本将会增大企业的经营负担,影响企业正常的投资行为,阻碍企业成长。因而,有效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对于民营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提高市场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认为,随着失信行为的增加,社会失信环境造成民营企业的营商环境恶化,提高信息不对称程度,进而通过增加协商成本和降低履约效率两个途径提高民营企业交易成本。

信用作为一种“软”约束力,对民营企业日常行为具有规范和管理作用。这在客观上减少了民营企业自身的违约、欺瞒等不当行为,从而为交易伙伴提供稳定的心理预期,降低由于彼此间信息不对称所增加的交易成本。就事前交易成本而言,社会失信环境下交易双方被迫投入更多的信息搜集

成本和协商成本。出于对企业潜在的机会主义行为的警惕,交易伙伴会就未来可能发生的状况进行长时间、困难的协商和讨价还价,还可能安排契约性和结构性的防御以保障自身利益。严重地,一个地区频发的失信行为会招致外部投资者和消费者对该地区民营企业的“集体惩罚”,迫使企业增加营销活动和广告投入。而地区失信行为相对较少则能够释放一种稳定的交易信号,这种信号表明该地区的民营企业为了交易的长期利益而愿意遵守合约,从而形成值得合作的效率声誉,有助于企业减轻对广告及展览等促销活动的依赖性,降低企业交易成本。

就事后交易成本而言,社会失信环境降低契约执行效率,提高交易成本,阻碍企业成长。如前所述,信用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规范约束作用能够降低企业违约风险,减少企业自身的不当行为,从而在客观上有助于企业降低监督执行成本。在社会信用水平良好的经济环境下,交易伙伴为了尽快销售其产品往往会向企业提供商业信用(Daniela and Menichini, 2010),即允许企业在获得货物后不立即支付货款,而是延迟一段时间后再支付。这种关联交易不仅有助于契约执行效率的提高(邵毅平和虞凤凤, 2012),而且能够减少企业对预防性现金的需求,降低交易成本。但是在社会失信环境下,交易者出于对合作方契约精神的质疑,往往选择设置“壁垒”,如添加附条件的合同条款等,这反而会增加企业交易成本,降低契约履行效率。

2. 社会失信环境通过加剧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难题阻碍民营企业成长

企业成长理论强调金融资源对于企业成长的重要性。互联网数据显示,80%的民营企业将融资约束难题视为影响自身发展的首要阻碍。现有研究多从微观层面的企业信用出发研究融资约束问题,认为信用缺失和融资约束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赵驰等, 2012),将融资困境等同于企业的信用困境(罗党论和甄丽明, 2008)。本文将关注点从微观层面的企业信用水平上升为宏观层面的社会失信环境,研究社会失信环境如何通过分别作用于民营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行为,恶化信贷主体间的信息不对称现象,从而提高民营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

就民营企业而言,社会失信环境助长了民营企业的 dishonest 行为,恶化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困境。从银企关系的角度出发,社会失信环境下失信行为的短期成本小于收益,民营企业更愿意选择不守信行为,如粉饰财务状况以获得贷款。但是在长期的信贷博弈下,这种为获取信贷资源而虚报财务信息的“短视行为”会造成金融机构的“信贷歧视”程度提高,失信行为使得单个企业甚至整个地区的信誉受损。从企业间关系的角度出发,关系网络具有促进信息共享、降低搜寻成本的作用(Cull et al., 2015),失信现象严重的地区很难形成长期合作的双边企业间关系。此外,在双边企业间,当一方企业需要资金融通时,另一方可以通过向银行提供抵押或担保品提高贷款企业的信用评级,从而有助于其获得银行贷款。同理,中小企业融资集群凭借组织平台优势为解决企业融资难问题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林洲钰和林汉川, 2009),而在社会失信环境下,企业间的合作关系难以形成,这在无形中阻止了产业集群的形成,进一步增加了民营企业获得信贷资源的难度。

就金融机构而言,社会失信环境会增加金融机构发放信贷资源的顾虑,减弱金融机构的贷款意愿,从而恶化融资约束问题。金融体系建设促进民营企业成长最为关键的作用机制在于“分配金融资源”。金融机构合理分配资金能够减轻民营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从而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增加企业的业绩(Greenwood and Jovanovic, 1990; King and Levine, 1993)。但是金融机构在资金分配上存在“所有制歧视”和“规模歧视”问题,民营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远远大于国有企业,这也会造成一部分信贷资金投向缺乏效率的项目,浪费金融资源(曾海舰和林灵, 2016)。一方面,民营企业成长面临巨大的资金缺口,另一方面,银行存储着大量资金不能分流。二者进入“囚徒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信用的缺失,社会失信环境下民营企业无法形成正确的价值观,民营企业信用意识淡薄,认

识不到“不违约才能获得更大收益”。陈雨露和马勇(2008)通过引入社会信用文化这一影响因子考察金融业绩,得出社会信用建设越完善,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越高、结构越合理的结论。可见,地区失信行为越少越有助于降低金融机构面临的信贷违约风险,金融机构对这些地区民营企业的发展前景更有信心,发放贷款的意愿更高。

3. 社会失信环境通过弱化民营企业技术创新能力阻碍企业成长

与国有企业拥有大量优质的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不同,民营企业往往承担更大的生存竞争压力。对于民营企业而言,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和提高企业创新效率是扩大市场占有率、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促进企业健康成长的重要路径(孙晓华和王响,2014)。而社会失信环境能够通过弱化产权保护力度和降低企业间研发合作效率两个途径,削弱民营企业技术创新能力,阻碍民营企业成长。

社会失信环境无法从道德约束的角度弥补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缺失,削弱民营企业创新积极性。产权保护制度是支撑现代经济社会有序运行的重要正式制度。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提高能够增加企业研发投入和专利产出,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然而,目前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仍有待完善,有效、及时的产权保护制度长期缺位,客观上助长了企业非法剽窃专利技术的风气,扩大了研发的外溢性,使得企业倾向于减少研发投入和原创性的技术创新项目。作为非正式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信用环境内含着微观企业用以自律的商业道德内涵,能够起到对正式制度的补充和替代作用,是法律之外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途径。如前所述,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对民营企业经营管理行为存在“软”约束力,减少其自身模仿、剽窃专利技术等不当行为(Dikolli et al.,2012)。但是在社会失信环境下,非法盗窃专利技术招致的道德舆论的谴责对失信企业几乎无法形成这种约束力,企业失信的心理成本极低,收获的却是专利技术带来的丰厚利润。根据“经济人”假设,理性的民营企业出于成本最小化的考虑,会“心安理得”地盗窃专利技术。在社会失信环境和研发外部性的共同作用下,民营企业“搭便车”的行为成为常态,长此以往,企业缺乏从事研发活动的激励,从而技术创新能力大为削弱,不利于民营企业成长。

社会失信环境不利于形成企业间的缔约关系,阻碍企业间专利研发合作,降低民营企业创新效率。研发成本的日趋高昂以及技术复杂度的逐渐提高要求企业与科学家必须进行更紧密的专利研发合作才能获得高效的创新产出。现有研究表明,在合作式 R&D 中较少的社会失信行为有助于合作双方结成 R&D 联盟(Carbon-Dhersin and Ramani,2004)。细致地讲,研发团队内部的失信行为通过抑制成员间的知识转移和信息共享,降低研发合作效率。柯江林等(2007)研究发现,团队社会资本对成员知识分享行为的解释力达到 91%,而知识分享与知识整合在团队社会资本和 R&D 团队效能关系中扮演了完全中介功能。社会失信环境具有外溢性,直接或者间接地通过抑制知识创造、加速知识转移来减少知识存量、降低技术创新效率,R&D 人员获得的信息越少其生产效率越低。而且在社会失信环境中,企业出于保护机密的考虑,不愿意与合作对象坦诚相待,信息共享机制的阻塞会在很大程度上降低研发合作的效率。

三、研究设计

1. 模型设定

本文开展实证分析的目的在于揭示中国各地区的社会失信环境是否能够影响民营企业成长,依据上述的理论机制分析构建如下的计量模型:

$$Growth_{ijt} = \beta_0 + \beta_1 Credit_{it} + \beta_2 Controls_{ijt} + \mu_i + \lambda_j + \delta_t + \varepsilon_{ijt} \quad (1)$$

其中, i 表示城市, j 表示企业, t 表示年份。 $Growth$ 为被解释变量,采用民营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

率加以衡量;*Credit*为核心被解释变量,表示社会失信环境,由企业失信指标和个人失信指标共同组成。*Controls*是一系列控制变量的集合,如教育水平、法制化水平、企业的资产负债率等,其具体设定方式在后续变量设定部分进行详细阐述。 μ 、 λ 和 δ 分别表示地区固定效应、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 ε 表示随机扰动项。

2.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分为以下三类:

(1)失信数据。用于衡量社会失信环境,来自最高人民法院开通的“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平台。其中记录的失信时间限定在1972—2018年,以失信被执行单位(执行法院、执行依据单位)为基础判断失信被执行人所在的地区,同一年份同一地区但被多次公告的失信被执行人不重复计数。

(2)微观企业数据。主要来自2004—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相较于行业数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包含更多维度的信息,有助于解决异质性问题,同时增加了估计的准确性,是研究企业行为最为理想的数据。但是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也存在样本错配、指标缺失、指标异常、测度误差等诸多问题。在数据处理方面,参考Cai et al.(2009)的做法,剔除资产总值、固定资产净值、主营业务收入、工业总产值缺失的观测值;参考Feenstra et al.(2014)的做法,删除不符合一般公认会计准则的数据,例如固定资产合计大于资产总值的观测值;剔除总资产以及固定资产净值小于等于零的观测值;筛选出登记注册类型为171、172、173、174的企业,即为后续研究的基准样本,共1588107家企业样本。由于失信指标为地级市层面的数据,在合并失信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数据时,先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按地级市创建地区ID变量,然后按照“地区ID+年份”进行合并。

(3)宏观经济数据。来自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专利统计年报汇编》。由于产权数据是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在合并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宏观经济数据时,先将产权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按省份建立省份ID变量,然后按照“省份ID+年份”进行合并,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的数据则根据地级市创建地区ID变量,然后按照“地区ID+年份”进行合并,期间无数据丢失。

3. 变量解释

(1)被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是民营企业的成长性,这种成长往往伴随着企业规模、销售能力和盈利水平等经济总量的动态变化。借鉴现有文献测度在企业成长性上的通常做法(Delmar and Shane, 2003; Chrisman et al., 2005),本文采用能够体现持续成长性的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作为代理变量。考虑到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可能存在的数据缺失、数值异常以及测度误差明显等问题,本文在实证研究中对增长率进行了1%的截尾处理。

(2)解释变量。社会失信环境由企业失信指标和个人失信指标共同测度。在个人失信指标方面,利用失信被执行人(自然人)数量与年末总人口的比值测度地区个人失信程度,记为*Personnumber*。在企业失信指标方面,利用失信被执行人(法人)数量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的比值来测度地区企业失信程度,记为*Firmnumber*。

(3)控制变量。实证检验社会失信环境对民营企业成长性的影响必须控制一系列相关的变量。参考有关企业成长的文献,以下变量也会对营业收入增长率产生影响:①教育投入水平。本文选用教育事业性行政支出占城市GDP的比重,记作*Education*。②法制化水平。考虑到指标的可获得性,本文将法制化水平分为司法行政环境和行政执法环境两类:一是司法行政环境,考虑到法治水平的高低会影响该地区失信被执行人数量,本文选用律师从业人员数量占地区年末总人口的比重作为衡量指标,记作*Law*;二是行政执法环境,本文选用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立案数占知识产权总数的比

重进行衡量,记作 Ipp 。③资金周转能力和产出水平。本文选用应付账款作为衡量资金周转能力的指标、工业总产值作为衡量民营企业产出水平的指标,并分别对其进行对数化处理,记作 $Debt$ 和 $Output$ 。④财务状况。本文选用资产与负债的比值衡量民营企业的偿债能力,同时这也是公司利用债权人资金进行经营活动能力的指标,记作 $Leverage$ 。⑤经营业务结构。本文选用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总收入的比重衡量民营企业的业务范围是否多元化,记作 $Business$ 。模型的各个变量的描述统计如表 1 所示。

表 1 模型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符号	含义	观测值	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因变量	$Growth$	收入增长率	1588107	1.1981	-0.5902	24.8462
自变量	$Personnumber$	个体失信人数	1203114	0.1242	0.0000	1.5601
	$Firmnumber$	企业失信数量	1313281	0.7813	0.0000	3.6092
控制变量	$Education$	教育投入水平	1588107	2.1004	0.0000	22.3604
	Ipp	司法行政环境	1588107	0.4180	0.0000	2.8280
	Law	法制化水平	1588107	1.7091	0.3031	11.6912
	$Debt$	资金周转能力	1568280	2.6694	0.0000	15.2852
	$Output$	产出水平	1586762	1.2873	0.0000	17.7091
	$Leverage$	财务状况	1577689	8.9242	0.1272	79.6623
	$Business$	经营业务结构	1587689	0.4941	0.0000	1.0000
中间变量	$Sell$	交易成本	1587404	3.0502	0.0000	46.6764
	$Finance$	融资约束	1587622	0.3642	0.0000	3.0561
	$Innovation$	创新	1230374	0.5513	0.0000	28.1403

4. 工具变量选择

内生性问题是变量因果关系识别中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社会失信环境的内生性可能由两方面引起:一是双向因果关系,社会失信环境能够通过“声誉机制”降低融资能力、提高交易成本,从而推动民营企业成长,而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后也会阻碍教育水平的提高和法律制度的完善,恶化社会失信环境;二是潜在的遗漏变量偏差导致的内生性。现有文献为了准确识别社会信用等因素的经济效应主要从宗教特征(Porta Scazzieri, 1997)、种族分散程度(Knack and Keefer, 1997)以及地区历史(Tabellini, 2010)等方面寻找工具变量。Zak and Knack(2001)和 Porta Scazzieri(1997)利用各国天主教、东正教和伊斯兰教信徒占总人口的比重作为社会信任的工具变量,分别验证了社会信任对地区经济增长和大型组织绩效的促进作用。戴亦一等(2019)选用上市公司周边 200 公里范围内的寺庙数量作为地区诚信水平的工具变量,认为宗教信仰的规范和约束作用(Mazar and Ariely, 2006)能够提升地区诚信水平。由此可见,区域宗教传统往往与非正式制度因素(包括社会信用)具有较强的相关性,这一直以来都是经济学者寻找工具变量的重要角度。

因此,参考阮荣平等(2019)将历史上省级层面的宗教活动场所数量为工具变量的做法,本文以地区佛教寺院数量为基础构建社会失信环境的工具变量,克服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就工具变量的有效性而言,佛教寺院能够通过道德宣教约束信徒行为,与社会失信环境具有强相关性。就工具变量的外生性而言,佛教寺院的成立程序繁琐且严格,而且本文采用的佛教寺院的数字是历史数据。佛教借以影响民营企业成长的效应,如道德净化、社会规范以及商业伦理的约定无一避免地要

通过影响社会信用发挥作用,而非直接影响企业成长。鉴于本文研究样本为面板数据,参照 Nunn and Qian (2014)研究中工具变量的设计方法,分别构造城市每百万人佛寺数量(与个体变化相关)与地区年失信自然人占比(*Personnumber*)均值和地区年失信企业占比(*Firmnumber*)均值(与时间相关)的比值作为相应个人失信指标和企业失信指标的工具变量。

四、实证结果分析

1. 基准回归结果

表2显示基准回归结果。从本文设定的工具变量的有效性看,第一阶段F值均大于10,说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而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表明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假设。第(1)、(2)列报告了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估计个人失信指标和企业失信指标对民营企业营业收入增长率的实证结果。由OLS估计结果可知,社会失信指标对民营企业成长的具有明显的阻碍作用,其中个人失信系数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企业失信系数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表2中第(3)~(6)列报告了工具变量估计结果。第(3)、(5)列的结果表明,社会信用缺失严重阻碍了民营企业的成长,个人和企业层面的系数分别通过了5%和1%的显著性检验。同时,第(4)、(6)列中第二阶段回归结果表明,在加入控制变量后内生解释变量社会失信环境仍旧显著地制约民营企业成长,并未发生明显变化,间接地说明满足了“排他性约束”要求(Burchardi and Hassan, 2013; 余泳泽和李启航, 2019)。相对于OLS估计结果,第(4)、(6)列报告的工具变量法的实证结果中解释变量的系数绝对值有所增大。这表明,社会失信环境的内生性使得最小二乘估计产生向下偏移,从而倾向于低估企业和个人失信对企业成长的阻碍作用。

2. 异质性分析

(1)东中西部地区异质性分析。考虑到企业样本的区域差异,本文将230个地级市按区域分为东中部和西部两个组别进行分区域的异质性分析,以验证上述结论的稳健性。表3报告了社会失信环境对东中部和西部地区民营企业成长的异质性影响。回归结果表明,无论是企业层面还是个人层面,社会失信环境对东中部地区的民营企业成长均具有明显的阻碍作用,统计上表现为个人失信指标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企业失信指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但是失信指标并没有显著地阻碍西部地区民营企业的成长。社会失信环境对东中西部地区企业成长产生异质性影响的原因在于:东中部地区的市场经济发展程度更高,科教文化事业在良好经济基础的扶持下更好地塑造了民众的守信意识,且东中部地区法制化体系更完善,执行力更强。在国家立法正式规范失信被执行人的履约行为之后,民营企业一旦失信,失信信息被公示将严重影响民营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故而对民营企业的破坏性更为强大;而中国西部地区市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市场规模相对较小,法治化和市场化进程明显落后于东中部地区,社会失信环境对民营企业的影响作用并未显现。

(2)一二、三线城市异质性分析。考虑到中国城市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并参考相关资料,本文将城市样本分为一二线城市和三线城市两个组别进行分经济发展水平的异质性分析,以验证基准回归结果的正确性。表4报告了社会失信环境对一二线和三线城市民营企业成长的异质性影响。回归结果表明,一二线城市个人失信指标对民营企业成长的阻碍作用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为负,企业失信指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阻碍民营企业成长。而三线城市的企業失信指标对民营企业成长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也从侧面验证了在一二线城市,诚实守信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隐形契约”,而且一二线城市经济更为发达,民营企业的数量更多,上升为正式制度的失信惩戒对企业行为的规范作用更为显著,社会失信环境对民营企业成长的阻碍作用更加明显。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OLS		2SLS			
	(1)	(2)	(3)	(4)	(5)	(6)
<i>Personnumber</i>	-1.8557*** (0.5204)		-3.3360** (1.4914)	-4.1006** (1.5822)		
<i>Firmnumber</i>		-0.3206** (0.1591)			-2.5369*** (0.9212)	-2.3337*** (0.7585)
<i>Education</i>	-0.0526*** (0.0178)	-0.0289 (0.0186)		-0.0598*** (0.0197)		0.1162** (0.0579)
<i>lpp</i>	-0.7979 (0.5765)	-0.9821*** (0.2914)		-0.9041 (0.6288)		-1.3033*** (0.4211)
<i>Law</i>	-0.5663 (0.3348)	-0.5246** (0.2074)		-0.2620 (0.4286)		-0.0584 (0.2754)
<i>Debt</i>	0.3225*** (0.0611)	0.2529*** (0.0241)		0.3071*** (0.0603)		0.2199*** (0.0263)
<i>Output</i>	2.4780*** (0.3502)	2.5942*** (0.1447)		2.4675*** (0.3393)		2.6157*** (0.1486)
<i>Leverage</i>	0.0308*** (0.0065)	0.0268*** (0.0026)		0.0298*** (0.0066)		0.0263*** (0.0025)
<i>Business</i>	2.5796*** (0.4876)	-3.0362*** (0.2342)		-1.9270*** (0.3988)		-1.9998*** (0.4288)
常数项	-24.2486*** (3.4235)	24.6421*** (1.4343)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第一阶段回归结果						
<i>Buddhist IV</i>			-0.0027** (0.0008)	-0.0027** (0.0006)	-0.4153** (0.1418)	-0.4297** (0.1286)
控制变量	是	是	否	是	否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128409	1236922	1128409	1128409	1223696	1223696
第一阶段 F 值			16.0800	16.2500	11.6400	11.1500

注:***、**、* 分别代表在 1%、5%、10% 的显著水平上通过了系数显著性检验。括号内是聚类的稳健标准误。以下各表同。

(3)城市收入水平的异质性分析。考虑到中国城市间居民收入水平的差异性,本文将城市样本按照人均 GDP 是否大于 2013 年的全国平均水平分为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两个组别进行收入水平差异的异质性分析,以验证基准回归结果的有效性。表 5 报告了社会失信环境对不同收入水平地区民营企业成长的异质性影响。回归结果表明,经济发达地区个人失信指标对民营企业成长的阻碍作用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上为负,企业层面的失信指标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阻碍民营企业成长。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社会失信现象对民营企业成长的影响并不显著。

(4)企业规模的异质性分析。为进一步考察社会失信环境对民营企业成长的异质性影响,本文将所选样本中的民营企业按规模分为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进行异质性分析。本文将职工人数小

表 3 东中西部异质性分析实证结果

变量	东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1)	(2)	(3)	(4)
<i>Personnumber</i>	-4.3695** (1.7693)		-15.2838 (14.0684)	
<i>Firmnumber</i>		-2.5882*** (0.8794)		-2.6596 (3.271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076185	1175102	52223	48594
R ²	0.3701	0.2990	0.5412	0.4054
第一阶段 F 值	15.7961	10.3052	7.6161	0.9020

注：省略了控制变量及常数项的回归结果。完整回归结果请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www.ciejournal.org>)附件。以下各表同。

表 4 一二、三线城市异质性分析实证结果

变量	一二线城市		三线城市	
	(1)	(2)	(3)	(4)
<i>Personnumber</i>	-3.8161** (1.3591)		-9.4375** (4.0333)	
<i>Firmnumber</i>		-1.6638*** (0.4256)		3.1433 (2.224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657369	775904	471020	447769
R ²	0.3640	0.3420	0.3240	0.2020
第一阶段 F 值	65.1200	20.4100	8.3400	2.9500

于 1000 人的定义为中小型民营企业,而将职工人数不小于 1000 人的定义为大型民营企业。表 6 报告了社会失信环境对不同规模民营企业的异质性影响。回归结果表明,无论是企业失信还是个人失信都极大阻碍了中小民营企业的成长,这一阻碍结果均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而对于大型民营企业,社会失信环境的影响并不显著,仅个人失信指标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上阻碍了民营企业成长。这表明没有较大的企业规模做担保的中小民营企业更易受到其信用行为的影响,良好的声誉和信用是保障中小型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关键。

3. 稳健性检验

(1) 更换企业成长指标代理变量的稳健性检验。除了收入增长率,利润增长率也是衡量企业成长性的一个重要指标。于是本文计算了样本期内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利润增长率,并将其作为衡量民营企业成长的指标,对基准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表 7 报告了更换被解释变量后社会失信环境对民营企业成长的回归结果。第(1)、(2)列 OLS 回归结果表明,个人失信对民营企业成长的作用

表 5 不同收入水平城市异质性分析实证结果

变量	发达地区		欠发达地区	
	(1)	(2)	(3)	(4)
<i>Personnumber</i>	-4.2041** (1.7550)		13.7104 (104.5831)	
<i>Firmnumber</i>		-2.1731*** (0.7312)		-1.4652 (1.950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903252	1016659	225146	207021
R ²	0.3771	0.3184	0.2920	0.3182
第一阶段 F 值	16.9000	11.0700	0.0200	2.8800

表 6 不同规模民营企业异质性分析实证结果

变量	中小企业		大型企业	
	(1)	(2)	(3)	(4)
<i>Personnumber</i>	-2.6343*** (0.9039)		-1.7960* (0.8922)	
<i>Firmnumber</i>		-1.0806*** (0.3439)		-0.5694 (0.434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719786	806216	393402	399417
R ²	0.2460	0.2150	0.2130	0.1371
第一阶段 F 值	12.4330	9.4300	17.2200	9.1200

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为负,而企业失信对民营企业成长的影响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上为负。根据第(3)、(4)列的 IV 回归结果,第一阶段回归的 F 统计量大于 10,说明并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表明,地区低信用水平与民营企业成长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其中个人失信指标和企业失信指标均通过了 5%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绝对值大于 OLS 回归下的值。这一结果进一步验证了社会失信环境对该地区民营企业成长起阻碍作用的结论。

(2) 更换社会失信代理变量的稳健性检验。“信用中国”有关数据显示,企业失信诉讼案件更多地涉及金融借款,从而使得企业失信程度与金融机构贷款量密切相关,同时失信行为的数量和罚款金额也会受到失信惩戒执行力度的影响。因此,本文更换了个人失信的数量和执行金额、企业失信被执行数量以及企业因失信而缴纳的罚款金额的处理方式来衡量社会失信环境。数据处理方式如下:个人失信部分,利用各地级市失信人数占该年度全国失信总人数的比重和各地级市个体失信的罚款金额占该年度全国个体失信罚款总金额的比重加以衡量,分别记作 *Personnum* 和 *Personmon*; 企业失信方面,以 2004—2013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为分母,分别用企业失信数量和被执行的失信企业罚款金额除以贷款余额,得出每百亿元贷款余额中失信企业所占

表 7 更换民营企业成长指标代理变量的实证结果

变量	OLS		2SLS	
	(1)	(2)	(3)	(4)
<i>Personnumber</i>	-4.9158*** (1.3121)		-15.8334** (7.2101)	
<i>Firmnumber</i>		-1.1741* (0.7322)		-9.1220** (3.697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112080	1219900	1112080	1207099
第一阶段 F 值			16.7700	11.2900

的比重和每百元贷款余额中企业失信罚款所占的比重,分别记作 *Firmnum* 和 *Firmmon*。表 8 报告了更换被解释变量后社会失信对民营企业成长的回归结果,OLS 回归结果表明,个人失信指标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阻碍了民营企业成长;而企业失信指标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上阻碍了民营企业成长。

表 8 更换社会失信代理变量的实证结果

变量	OLS			
	(1)	(2)	(3)	(4)
<i>Personnum</i>	-11.3421*** (0.2501)			
<i>Personmon</i>		-9.0413*** (0.4840)		
<i>Firmnum</i>			-5.4364** (2.4602)	
<i>Firmmon</i>				-3.9730** (1.542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411106	1411106	1236922	1514205
R ²	0.8632	0.8632	0.8924	0.8781

注:第(1)、(2)列是非聚类标准误。

(3)控制社会信任代理变量(*Trust*)的稳健性检验。本文旨在论述社会失信环境对民营企业成长的影响机制,但是社会信用与社会信任之间联系密切,为了排除“民营企业成长是由社会信任水平所决定的”这一可能性,本文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库 2015 年调查问卷设置的问题“一般来说,您对现在社会上的陌生人是否信任?”为依托,将被访者的回答“非常不信任、不信任、一般、信任、非常信任”按信任水平分别赋值为 1、2、3、4、5,然后将每个省份所有居民的选择取平均值作为社会信任水平的代理变量,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 9 所示。通过对比表 2 的主回归结果和表 9,可以发现在加入社会信任代理变量之后,社会失信变量的系数值并未发生明显增减,且显著性水平保持一致。此外,第一阶段 F 值均大于 10,表明不存在弱工具

表 9 控制社会信任代理变量的实证结果

变量	OLS		2SLS	
	(1)	(2)	(3)	(4)
<i>Personnumber</i>	-1.7081*** (0.4210)		-4.4641** (1.8883)	
<i>Firmnumber</i>		-0.3912** (0.1552)		-2.7702*** (0.7864)
<i>Trust</i>	-12.1261*** (3.6452)	-10.1792*** (2.8682)	-7.8691* (4.4954)	-5.4672* (2.813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144436	1253035	1144436	1239354
第一阶段 F 值			18.9300	10.8600

变量问题。

(4) 更换工具变量的稳健性检验。为克服内生性问题带来的干扰,本文还借鉴 Fisman and Svensson(2007)的做法,使用相邻城市的社会失信水平的平均值作为本地区社会失信环境的工具变量。邻近城市社会失信的平均水平取决于范围内每个城市的信用环境特征,但是这一平均值与特定地区的民营企业成长并无直接联系,因此满足工具变量相关性和排他性的要求。根据表 10,第一阶段 F 值均大于 10,表明通过了弱工具变量检验,且与表 2 的回归结果相比,第(2)、(4)列系数绝对值有所下降。社会失信环境对民营企业成长的阻碍作用仍然成立,且个人失信指标和企业失信指标均通过了 1%的显著性水平。

表 10 更换工具变量的实证结果

变量	2SLS			
	(1)	(2)	(3)	(4)
<i>Personnumber</i>	-3.6001*** (0.9684)	-2.8012*** (0.6320)		
<i>Firmnumber</i>			-0.8662*** (0.0773)	-1.0164*** (0.2731)
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第一阶段回归结果				
<i>Buddhist IV</i>	1.0938*** (0.0597)	1.0900*** (0.1384)	0.8663*** (0.0769)	0.7794*** (0.0869)
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128409	1128409	1223696	1223696
R ²	0.3170	0.3878	0.2010	0.3885
第一阶段 F 值	335.3300	292.8000	127.0400	80.3600

五、中间机制检验

根据以上实证结果分析可知,社会失信环境能够显著地减缓该地区民营企业的成长速度,而失信现象的改善对本地区民营企业的成长具有推动作用。基于理论机制部分的分析,本文认为社会失信环境通过提高交易成本、增加融资约束和破坏企业创新等路径阻碍民营企业成长。根据上述理论机制分析内容,本文构造了如下的实证回归模型:

$$M_{jt} = \alpha_0 + \alpha_1 Credit_{it} + \alpha_2 Controls_{jt} + \mu_i + \lambda_j + \delta_t + \varepsilon_{ijt} \quad (2)$$

其中, M 表示中间机制变量,其他变量与式(1)相同。模型中其他变量定义与前文一致,中间变量的指标选取说明如下:

企业交易费用($Sell$)。要全面衡量企业经营活动中的交易成本是困难的,故从可度量的角度出发,并参考冯泰文(2009)年的做法,本文选择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列示的与经营活动有关的费用进行加总,并将其进行对数化处理作为代理变量进行描述,记作 $Sell$ 。

融资约束程度($Finance$)。衡量融资约束的指标没有统一的规定,参考张杰等(2012)的做法,本文通过构建企业的现金流指标衡量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记作 $Finance$,计算公式为:

$$Finance_{jt} = (Profit_{jt} + Depreciation_{jt}) / Asset_{jt} \quad (3)$$

其中, $Profit$ 表示利润总额, $Depreciation$ 表示折旧额,而 $Asset$ 表示总资产。现金流指标越高,表明企业越容易通过自身的经营活动满足融资需求,该企业受到的外部融资约束越轻。

企业创新水平($Innovation$)。创新是民营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也是民营企业成长的根本动力。衡量企业创新产出的指标多为专利产出及新产品产出情况,本文选择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新产品产出与产品总产出的比值作为代理变量,记作 $Innovation$ 。

表 11 报告了社会失信环境与交易成本、融资约束和创新能力的中间机制实证结果。第(1)—(6)列分别显示了社会失信指标与三个中间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其中,个人失信水平和企业失信水平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与交易成本正相关,这说明社会失信现象越严重,民营企业开展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就越高;社会失信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该地区民营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现象,且均通过了 10%的显著性检验,也佐证了理论机制分析中社会失信环境会增加民营企业贷款难度的结论;个人失信水平和企业失信水平对创新的作用均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说明社会失信环境不利于企业创新,佐证了理论机制的分析结果。

表 11 中间机制检验的实证结果

变量	$Sell$		$Finance$		$Innovation$	
	(1)	(2)	(3)	(4)	(5)	(6)
$Personnumber$	2.2708** (1.0070)		-0.7269* (0.3891)		-0.1649** (0.0763)	
$Firmnumber$		0.9506** (0.5041)		-0.4328* (0.2459)		-0.1363** (0.056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128377	1223656	1067129	1163277	847528	922970
第一阶段 F 值	16.2500	11.1610	8.5000	11.1500	21.3600	11.7300

六、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1. 主要结论

民营企业持续健康成长不仅依赖于经济因素,更依赖于政治文化因素。本文基于社会失信环境的制度属性,利用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2004—2013年230个地级市失信被执行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数据,验证了社会失信环境对地区民营企业成长的阻碍作用。为了解决内生性问题,本文以城市每百万人佛寺数量作为失信指标的工具变量,系统检验了社会失信环境对地区民营企业成长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主要结论如下:①社会失信环境显著阻碍了民营企业的成长,无论是个人失信指标还是企业失信指标都验证了这一结论。②稳健性检验部分通过分别更换民营企业成长的代理变量、更换社会失信水平的代理变量、排除社会信任水平因素的干扰以及更换工具变量多角度支撑了社会失信环境阻碍民营企业成长的结论。③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东中部地区、一二线城市和高收入城市等发达地区,由于这些地区对失信惩戒的执行力度更大,揭露的失信现象更多,民营企业成长受失信环境的影响更显著;而就企业规模而言,中小民营企业的成长更加受制于本地区的社会失信环境。④中间机制检验的结果证实了社会失信环境借以影响民营企业成长的路径,即通过提高交易成本、加剧融资约束和破坏企业创新来阻碍本地区民营企业成长。

2. 政策建议

(1)通过强化监督和加强技术支持确保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的有效实施,为民营企业成长提供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社会信用体系的健康运行是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激活各类市场活力的重要途径,有助于为民营企业成长构建良好的营商环境。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能够通过整合各项有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社会资源优化资源配置,降低民营企业开展市场交易的风险和成本、保障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和市场经济秩序的平稳开展。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是建设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途径,因此要严格按照程序执行将失信人员纳入“黑名单”的制度,同时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作用,整合合同履行、信贷活动以及法院判决等各类信用信息,建立个人和企业的信用档案,形成失信信息的共享机制,实现跨地区、跨部门的信息共享、资源联动,利用信用信息行之有效地规范失信行为。在此过程中还应该加强社会舆论监督和行政监督,将信用体系建设工作纳入地方政府政绩考核范畴,避免地方政府过于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2)推进信用法制建设,弘扬诚实守信的法治精神,从司法层面强制企业减少失信行为,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良好运行提供法治保障。良好的法制环境对民营企业的发展发挥着强有力的推动作用,在大力建设社会信用体系的同时,政府和有关机关必须加强信用法制建设,建立健全社会征信体系,为惩治失信行为提供更具约束力的法律保障。民营企业的成长过程中往往缺乏有效的法律保护 and 稳定的政策支持,这就造成了交易市场上民营企业信用缺失、市场秩序难以维系的混乱现象。法律是制裁机会主义行为的主要手段,一方面,当失信的成本大于人们预期的收益时,人们会被迫放弃投机行为,而选择守信。因此应该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为契机,将失信行为所造成的外部损失纳入司法认定的赔偿范围,加大行政处罚力度,集中治理信用缺失的突出问题;另一方面,要制定法律法规规范企业失信记录在市场准入、征信服务等商事领域将要面临的限制性政策,统一构建对于恶意违约、商业欺诈、偷逃税款等失信行为的预警和惩戒机制,增强交易主体之间的信息透明度。

(3)通过信用文化传播、诚信司法示范以及提高企业信用意识加强信用文化的培育,为民营企业成长提供信念支持。信用文化有着鲜明的示范效应,通过引导民营企业的信用价值取向,帮助民

营企业树立诚实守信的经营理念,形成“守信激励、失信惩戒”的社会信用环境和氛围。信用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程,必须夯实基础,持续发力。因此,为了应该营造良好的信用文化氛围,有关部门要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配合各级法院公布失信被执行人的相关信息,实现传播内容和方式的创新,大力弘扬诚信文化。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过程中贯彻落实诚信司法的理念,提高司法公信力,为信用文化的培育做出示范。民营企业要从自身的发展前景出发,放弃投机心理和短期行为,提高自身的信用意识和信用管理水平,加强信用制度建设,积极承担保证质量安全、保护生态环境的社会责任,增加信用投资。民营企业通过营造遵守信用的企业文化氛围,以信用为纽带,以社会声誉为桥梁,夯实市场根基,成就品牌效应,助推民营企业发展壮大。

[参考文献]

- [1]曹春方,周大伟,吴澄澄. 信任环境、公司治理与民营上市公司投资现金流敏感性[J]. 世界经济, 2015,(5):125-147.
- [2]陈叶烽,叶航,汪丁丁. 信任水平的测度及其对合作的影响——来自一组实验微观数据的证据[J]. 管理世界, 2010,(4):54-64.
- [3]陈雨露,马勇. 社会信用文化、金融体系结构与金融业组织形式[J]. 经济研究, 2008,(3):29-38.
- [4]戴亦一,张鹏东,潘越. 老赖越多,贷款越难?——来自地区诚信水平与上市公司银行借款的证据[J]. 金融研究, 2019,(8):77-95.
- [5]杜传忠,郭树龙. 经济转轨期中国企业成长的影响因素及其机理分析[J]. 中国工业经济, 2012,(11):97-109.
- [6]冯泰文. 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对制造业效率的影响——以交易成本和制造成本为中介变量[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9,(3):56-65.
- [7]何凌云,陶东杰. 营商环境会影响企业研发投入吗?——基于世界银行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8,(3):50-57.
- [8]黄速建,王钦,贺俊. 制度约束、需求驱动和适应性选择——中国民营企业治理演进的分析[J]. 中国工业经济, 2008,(6):5-16.
- [9]柯江林,石金涛,孙健敏. 团队社会资本的维度开发及结构检验研究[J]. 科学学研究, 2007,(5):935-940.
- [10]李四海,刘星河,吴伟炯. 社会信任环境与民营企业债务融资研究[J]. 金融评论, 2013,(2):75-88.
- [11]林洲钰,林汉川. 中小企业融资集群的自组织演进研究——以中小企业集合债组织为例[J]. 中国工业经济, 2009,(9):87-95.
- [12]罗党论,甄丽明. 民营控制、政治关系与企业融资约束——基于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金融研究, 2008,(12):164-178.
- [13]阮荣平,郑风田,刘力. 宗族文化与家族企业治理的血缘情结[J]. 管理世界, 2019,(7):116-135.
- [14]邵毅平,虞凤凤. 内部资本市场、关联交易与公司价值研究——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J]. 中国工业经济, 2012,(4):102-114.
- [15]孙晓华,王昀. 企业规模对生产率及其差异的影响——来自工业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 2014,(5):57-69.
- [16]王伟光,马胜利,姜博. 高技术产业创新驱动中低技术产业增长的影响因素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 2015,(3):70-82.
- [17]邹爱其,金宝敏. 个人地位、企业发展、社会责任与制度风险:中国民营企业政治家政治参与动机的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 2008,(7):141-150.
- [18]夏后学,谭清美,姜启波. 转轨背景下简政放权与腐败对技术创新的交互效应——研发产出与制度差异视角[J]. 研究与发展管理, 2017,(5):123-136.
- [19]徐光,赵茜,王宇光. 定向支持政策能缓解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吗?——基于民营企业债务融资支持工具政策的研究[J]. 金融研究, 2019,(12):187-206.

- [20]杨继生,黎娇龙. 制约民营制造企业的关键因素:用工成本还是宏观税负[J]. 经济研究, 2018,(5):103-117.
- [21]余明桂,钟慧洁,范蕊. 民营化、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J]. 金融研究, 2019,(4):75-91.
- [22]余泳泽,李启航. 城市房价与全要素生产率:“挤出效应”与“筛选效应”[J]. 财贸经济, 2019,(1):128-143.
- [23]曾海舰,林灵. 企业如何获取融资便利?——来自上市公司持股非上市银行的经验证据[J]. 经济学(季刊), 2016,(1):241-262.
- [24]张杰,芦哲,郑文平,陈志远. 融资约束、融资渠道与企业 R&D 投入[J]. 世界经济, 2012,(10):66-90.
- [25]赵驰,周勤,汪建. 信用倾向、融资约束与中小企业成长——基于长三角工业企业的实证[J]. 中国工业经济, 2012,(9):77-88.
- [26]Acemoglu, D., U. Akcigit, N. Bloom, and W. R. Kerr. Innovation, Reallocation and Growth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3,108(11):3450-3491.
- [27]Bloom, N., B. Eifert, A. Mahajan, D. McKenzie, and J. Roberts. Does Management Matter? Evidence from India[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 2013,128(1):1-51.
- [28]Burchardi, K. B., and T. A. Hassan. The Economic Impact of Social Ties: Evidence from German Reunification[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3,128(3):339-351.
- [29]Cai, H., L. Qiao, and X. Geng. Does Competition Encourage Unethical Behavior? The Case of Corporate Profit Hiding in China[J]. *Economic Journal*, 2009,(119):764-795.
- [30]Carbon-Dhersin, M. L., and S. V. Ramani. Does Trust Matter for R&D Cooperation? A Game Theoretic Examination[J]. *Theory and Decision*, 2004,57(2):143-180.
- [31]Chrisman, J., J. H. Chua, and L. Steier. Sources and Consequences of Distinctive Famines: An Introduction[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05,29(3):237-247.
- [32]Cull, R., W. Li, B. Sun, and L. C. Xu. Government Connections and Financial Constraints: Evidence from a Large Representative Sample of Chinese Firms[J].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2015,32(1129):153-158.
- [33]Daniela, F., and A. M. Menichini. Trade Credit, Collateral Liquidation, and Borrowing Constraints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0,96(3):413-432.
- [34]Delmar, F., and S. Shane. Does Business Planning Facilitate the Development of New Ventures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3,24(12):1165-1185.
- [35]Dikolli, S. S., W. J. Mayew, and T. D. Steffen. Honoring One's World: CEO Integrity and Accruals Quality[R]. SSRN Working Paper, 2012.
- [36]Dincer, O. C., and E. M. Uslander. Trust and Growth[J]. *Public Choice*, 2010,142(1-2):59-67.
- [37]Feenstra, R., Z. Li, and M. Yu. Export and Credit Constraints under Incomplete Information: Theory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from China[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14,96(6):729-744.
- [38]Fisman, R., and J. Svensson. Are Corruption and Taxation Really Harmful to Growth? Firm Level Evidence[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7,83(1):63-75.
- [39]Greenwood, J., and B. Jovanovic. Financial Development, Growth,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4):827-852.
- [40]He, X. The Development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Private Enterpris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Its Relevance to Transitional Economics[J].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Entrepreneurship*, 2009,14(1):39-58.
- [41]King, R. G., and R. Levine. Finance, Entrepreneurship and Growth[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93,(32):513-542.
- [42]Knack, S., and P. Keefer. Does Social Capital Have an Economic Payoff? A Cross-Country Investigation[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7,112(4):1251-1288.
- [43]Laursen, K., F. Masciarelli, and A. Prencipe. Regions Matter: How Localized Social Capital Affects Innovation

- and External Knowledge Acquisition[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12,(1):177-193.
- [44]Mazar, N., and D. Ariely. Dishonesty in Everyday Life and Its Policy Implications [J].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rketing*, 2006,25(1):117-126.
- [45]Nunn, N., and N. Qian. U.S. Food Aid and Civil Conflict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4,104(6):1630-1666.
- [46]Porta, P. L., and R. Scazzieri. Towards an Economic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Civil Society:Trust, Trade and Open Government[J].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1997,8(1):5-28.
- [47]Tabellini, G. Culture, and Institutions: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Regions of Europe [J].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2010,8(4):677-716.
- [48]Xie, F., B. Zhang, and W. Zhang. Trust, Incomplete Contracting and Corporate Innovation [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17,8(607):1015-1077.
- [49]Zak, P. J., and S. Knack. Trust and Growth[J]. *Economic Journal*, 2001,111(470):295-321.
- [50]Zhao, S. Government Policies and Private Enterprise Development in China:2003—2006 [J]. *China and World Economy*, 2009,17(4):36-52.

Social Dishonest Environment and Private Enterprise Growth——Empirical Evidence from Urban Dishonest People

YU Yong-ze¹, GUO Meng-hua², HU Shan²

(1.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Trade, NUFE, Nanjing 210046, China;

2. Industrial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NUFE, Nanjing 210046,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uses private enterprises in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China as a research sample, and uses the data of untrustworthy persons released by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to accurately measure the social untrustworthy environ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dishonesty environment, this article uses the number of regional Buddhist monasteries as an instrumental variable, integrates micro-level industrial enterprise data, and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the social dishonesty environment on the growth of private enterprises. And on this basi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theoretical mechanism between social dishonesty environ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enterprise.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The environment of social dishonesty has a significant hindering effect on the growth of private enterprises in the region, especially in the more developed eastern and central regions, first-tier and second-tier cities, and high-income cities; in terms of business scale, the growth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private enterprises is more constrained by the untrustworthy environment in the region, while large private enterprises are endorsed by their scale and brand, and are less affected by the social untrustworthy environment; the intermediate mechanism test shows that the social untrustworthy environment will increase transaction costs, deepen the degree of financing constraints, and hinder enterprise innovation, so that it can inhibit the growth of private enterprises in the region. The conclusions have certain enlightenment for tak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untrustworthy person list system as an opportunity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ocial credit system, to create a good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to promote rapid growth of private enterprises.

Key Words: social dishonest; private enterprise; transaction cost; information asymmetry

JEL Classification: D21 R38 L25

[责任编辑:李鹏]